

---

# 中国文化村镇的基本内涵与 历史变迁研究

王晓静 刘士林<sup>1</sup>

2014年《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提出“注重人文城市建设”。从空间层级体系看，中国的人文城市从高到低可以分为文化带（城市群）、全国文化中心城市（北京）、文化大都市（上海等）、文化城市和文化村镇五个层级。文化村镇尽管处在最低的层级，但也经过了多年的规划建设，同时也是国际社会和国际组织比较重视的。如2019年6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曾在四川省眉山市主办“文化2030 城乡发展：历史村镇的未来”国际会议。对中国文化村镇进行理论研究，考察其历史变迁轨迹和未来发展趋势，不仅可以与全球历史村镇的理论探讨进行对话，也可为中国人文城市体系建设提供具体经验。

## 一、中国文化村镇的概念内涵和基本情况

从“文化村镇”的字面意义出发，可以初步得出两个判断，一是在空间上主要包括镇、村两级，二是在时间上有一定的传承性。政府部门认定和统计的范围大体涉及到三种类型。一是原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组织评选的“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二是原建设部（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文化部（现文化和旅游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联合组织评选的“中国传统村落”；三是2017年文化部课题组提出的作为特色小镇类型之一的“特色文化小镇”。以这三者为重点，可得到关于中国文化村镇的总体情况。

第一，“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是由原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从2003年起共同组织评选的，历史文化保存文物特别丰富并且具有重大历史价值或革命纪念意义的，能较完整地反映一些历史时期传统风貌和地方民族特色的镇和村（主要指建制镇和行政村）。

自2003年第一次评选出22个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开始，到2019年共评选了7批次，有799个村镇入选。据住建部公布的数据显示，截止到2017年，全国共有建制镇18085个，行政村533017个，合计551102个。对比来看，入选中国历史文化名镇名村名录的不到1.45%。

第二，“中国传统村落”是从“古村落”的概念转化而来的。按照传统村落保护和发展专家委员会的意见，传统村落是为了突出古村落的文明价值及传承的意义而决定更名的。

2012年4月，《住房城乡建设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财政部关于开展传统村落调查的通知》指出：“传统村落是指村落形成较早，拥有较丰富的传统资源，具有一定历史、文化、科学、艺术、社会、经济价值，应予以保护的村落。”截至2019年6月已有5批次，共6819个传统村落被列入“中国传统村落名录名单。对比2017年全国行政村的数量来看，仅占1.28%。

第三，关于“特色文化小镇”的基本情况，是由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课题组在项目研究成果中提供的。该研究提出了狭义和广义两种统计概念：广义上的特色文化小镇是指围绕文化产业的某个或某些门类，集聚融合众多上游、中间和下游产业，发展形成跨行业、跨领域的完整价值链，如文化旅游小镇、文化体育小镇等；狭义的特色文化小镇主要指文化产业内部

---

**作者简介：**王晓静，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助理研究员、博士；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城市科学研究院院长、教授。

---

企业、产品高度集聚，生产、销售的专业化、规模化程度高，在文化产业的某个或某些门类形成具有核心竞争优势的产业集群，如音乐小镇、非遗小镇等。

以 2016 年住房城乡建设部公布的国家级特色小镇和各省公布的省级特色小镇（共计 1286 个）为研究对象，共有广义的特色文化小镇 798 个，在特色小镇总数中的占比为 62.1%；狭义上的特色文化小镇为 60 个，占比为 4.7%。特色小镇绝大多数都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同时也都重视发展文化旅游业。因此，特色文化小镇应是中国文化村镇的重要组成部分。

对此要加以说明的是，在以上三类中有不少交叉或重复，如不少历史文化名镇名村陆续入选为“特色小镇”或“中国传统村落”，同时也有一些条件很好的文化村镇，由于申报审批等原因未能列入其中，所以这三个数据只是一种大概的参考。

关于中国文化村镇的现状和问题，在这三个类型中可以说相差不大。以数量最大、涉及面最广的“中国传统村落”为例，初步可得出三点主要结论。

一是目前保护的有限。2012 年 9 月，住建部、文化部、国家文物局和财政部发布信息显示，中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登记上报了 11567 个传统村落，但纳入保护名录的仅略高于 5.58%。截止到 2017 年全国约有乡镇级建制单位 28399 个，自然村数量达 2448785 个，因此未来的保护任务还非常繁重。

二是开展保护刻不容缓。在快速的城镇化进程中，中国传统村落的生存状况日趋恶化。有研究指出，从 2000 年到 2017 年，中国自然村落总数从 363 万个大幅锐减，达到了平均每天消失 190 个的速度。从 2005 年到 2013 年，古村落由 5000 个下降到不足 3000 个，平均每年消失 250 个。因此才有专家呼吁说“再不保护就来不及了”。

三是保护政策供给日益完善。在各界的共同努力和参与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纷纷行动起来，相关部委先后发布多个与中国文化村镇保护相关的政策文件，形成了相对完善的政策体系，为中国文化村镇能够走向未来提供了有力保障。

## 二、中国文化村镇的主体功能变迁与重建之路探索

农村和城市的矛盾不是始于今天，陶思炎等著《中国都市民俗学》里提到：“随着经济的发达，城市的繁荣和文明程度提高，生活在都市中的人总是处于一种脱离自然的境地。因此，人们不愿囿于人工化的都市景观，总想回到大自然的怀抱。他们利用各种节假日到乡村旅游，吃住在农村，重新拾回淳朴的感觉。这不仅是现代都市人的行为，在古代就有先例。

寒食节本是上古时期某种自然崇拜的禁忌，后世附会以追忆介子推来表达对逝去之人的纪念。从隋唐开始，寒食节虽在宫廷内仍有禁火和颁赐新火的仪式，但在民间却演变为郊游踏青、荡秋千、拔河、蹴鞠、斗鸡以及放纸鸢等游艺活动的节庆日。”但毫无疑问的是，在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城市化的背景下，中国文化村镇的主体功能已发生巨变，并给今天的中国文化村镇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最大挑战。

### （一）中国文化村镇主体功能变迁的表现形式

#### 1、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小农生产方式全面萎缩

从生产方式上看，文化村镇的主导产业是农业，即使有商业和其他副业存在，也都是从属的和次要的。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体系受到了致命冲击。其后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乡村的贫困或相对贫困问题；二是乡村人口的流失或“空心化”问题。

---

这不仅是近现代中国在工业化进程中的教训，也是当代中国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以2015年以来的特色小镇建设为例，初衷就是为了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提高农民收入，增加就业机会，改变农村的空心化和停滞状态。

## 2、以实用理性为代表的传统农业文化日渐式微

从文化传承上看，文化村镇的主体是耕读文化，在古代世界中也曾创造出有永恒魅力、诗一样的田园生活方式。但随着现代工业打破了人和自然的和谐关系，现代文明也席卷了朴素、自然、随遇而安、节奏舒缓的传统生活方式。

从中国古代诗人的“昨日入城去，归来泪满巾”，到现当代很多作家写过的“人到城市就变坏”，都体现了对这个历史过程的“不理解”和“不适应”。在小农经济退场后重建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耕读文化退场后重建一种新的价值体系，成为中国文化村镇在现代世界生存发展必须解决的两大问题。

### (二) 中国文化村镇现有发展模式

为了应对环境突变的持续挑战，中国文化村镇不断进行着各种求索。改革开放以来至少形成了三种发展模式。

#### 1、文化遗产保护模式

这一模式的侧重点是保护传统乡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和传承人，通过制定相关政策、给予财税优惠、动员社会广泛参与等手段，使各种青黄不接、濒临灭绝的乡村文化遗产得以延续。由于缺乏具有自身造血功能的经济基础，这类文化村镇始终处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中。

#### 2、以乡镇企业为代表的工业化模式

这种以工业化带动文化村镇发展和复兴的模式，主旨是要为日益凋敝的村镇找到一种新的生产方式，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问题在于，最后把文化村镇变成了繁华城市，甚至在某些方面比城市还现代化，因此也就违背了复兴村镇文化的初衷。

#### 3、以乡村旅游业为代表的商业化模式

这种以商业化带动村镇建设的模式，最终把文化村镇变成了热门景区，其最大的问题是为了商业利益，把大量异质性的建筑和功能楔入了文化村镇，在这种“资本的游戏”中，最受损的恰是文化村镇本身。

这三种模式都未能把文化村镇特有的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体系传承下来，所以并没有找到中国文化村镇的真正出路。

### (三) 中国文化村镇的重建方向

以上这些曲折和代价至少在文化村镇发展中形成了三点认知：一是对于文化村镇的发展和复兴，最重要、最核心、最关键的是经济基础重建，以填补传统小农经济体系崩溃后的空白。二是要拯救衰败的乡村，不仅需要依托产业，更重要、更核心、更关键的是必须选择符合文化村镇发展规律的产业，或者说如何找到或构建适合现代化、城镇化条件的文化村镇产业体系。

二是文化村镇要想获得真正的未来，还必须妥善处理好“文化保护”和“经济建设”的关系，这两者对于文化村镇发展而言，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条件，前者的任务是找到历史文化传统最适合的传承方式，避免出现“脱有形似，握手已违”的局面，后者的作用是找到最适合文化村镇的现代产业，解决自身经济基础日益不稳定的问题。

---

在这两者的关系上，中国近 40 年来的村镇建设经验证明，经济基础和产业体系重建是关键。以近年来的特色小镇建设为例，和城镇化容易陷入的误区一样，由于在起步阶段背离了“产业支撑”的初衷，不是通过产业导入和培育来集聚人口，而是采取房地产开发的模式，把农村作为新一轮房地产开发的乐土，不仅没有实现乡村发展和人口集聚，反而导致了对文化村镇新一轮的建设性破坏。因此，如果不能为农业经济退出后的文化村镇找到合适的产业支柱，也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日渐式微的现实命运。

由于现代产业体系十分复杂，此外还有因过去大力扶持乡镇企业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农村不像农村”等教训，因此仅仅知道“需要产业”是不够的，还应深入研究和探讨文化村镇到底需要什么产业。近年来在产业重建之路上，中国文化村镇初步形成了两点共识。

一是旅游产业优于工业产业。文化村镇由于自身的社会条件和基础所限，很难发展代表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新兴产业，同时，这些产业一般对农村自然环境也会造成污染和损害，会在根本上弱化和掏空文化村镇赖以存身的自然资源和环境条件。

其次，旅游业是近年来国家大力推进的新型产业，为生产功能逐渐弱化、自然文化资源独特的文化村镇以旅游业替代农村经济、腾退落后的乡镇企业提供了战略机遇，因此越来越多的文化村镇主动参与了这个进程。

二是旅游产业必须和文化融合发展。一段时间以来，文化村镇旅游的突出问题可以概括为“过度商业化”和“同质化”，曾有媒体批评江南古镇周庄“十步之内，必有蹄髻”。

在某种意义上，包括饮食在内的民俗以及自然景观，各地的差别不会很大，同时也都容易被模仿而导致恶性竞争。要改变这个问题，必须植入文化内容，构建“以文促旅”和“以旅彰文”的良性循环关系。

因此，对于文化村镇而言，最适合的产业不是工业，也不是旅游业，而是文化和旅游产业。这是一种最大限度利用自身优势、最小破坏传统遗产、最大发挥文化传承和教育功能的新型产业。深入研究文化村镇的文化资源，将其融入到旅游项目和产品开发中，是解决旅游产业内容供给不足和文化村镇文化无所寄托的重要发展思路。

### 三、中国文化村镇保护的观念变革和传承方法

#### （一）保护文化村镇与城市发展的逻辑关系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人们以为保护文化村镇是为了文化村镇本身，是一种对衰老的、弱势的对象的怜悯、同情甚至施舍行为，这就难免形成一种城市-主体和村镇-客体的不平等关系，前者总是无意识地表现出各种傲慢和武断。但随着文化村镇保护实践的不断深入，这种“城市-保护者”和“村镇-被保护者”的观念发生了很大变革。

人们逐渐意识到，保护文化村镇主要是出于城市发展的内在需要。在理论层面上，正如芒福德指出：“从生态上说，城市与农村是一个整体，谁也离不开谁。如果谁能离开而独立生存下来的话，那是农村，不是城市。”

在现实层面上，城镇化的目的并不是消灭乡村，而是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3 年 12 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上指出，城镇化的理想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而这里的山、水和乡愁，在逻辑上都是属于大自然和文化村镇的资源和财富。

城市更离不开乡村的深层原因之一是出于人的审美天性和自由发展的需要。恩格斯曾指出：“每一种新的进步都必然表现为对某一神圣事物的亵渎，表现为对陈旧的、日渐衰亡的、但为习惯所崇奉的秩序的叛逆。”

---

城市比乡村当然是一种巨大的进步，但同时也是一种倒退。比如它割断了乡村人和大自然直接的联系，也彻底打乱了人在田园生活中“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和“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自由的生活和生命节奏。与之相比，在资本主义大生产中，正如席勒指出：“享受与劳动脱节、手段与目的脱节、努力与酬报脱节。”

永运束缚在整体中一个孤零零的断片上，人也就把自己变成一个断片了。”人在文明进程中导致的这种异化，是中外哲人、艺术家提倡“回归自然”和赞美“乡村生活”的根源。当今世界是城市世界，生存和竞争的压力无所不在，这种情况正变得更加严重。

正如卢卡奇对手工业协作、手工业工厂到机器工业的发展进行考察后指出：“分工中片面的专门化越来越畸形发展，从而破坏了人的人类本性”，而像陶渊明希望回归的田园也早已不复存在。这就导致了一种新的精神矛盾和审美需要，即“在理性上必须选择城市，在情感上又希望回到村镇”。

文化村镇是一个城市在童年时代的文化灵魂，而把文化村镇保护好、传承好，就是为城市人提供了可以安顿生命的家园。就此而言，当然是城市人比农村人更需要文化村镇。

## （二）文化村镇与城镇化进程的新型关系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并不是过去人们不知道乡村对于城市的重要性，而是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还没有发展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因此，中国文化村镇保护观念的变革，与新型城镇化的总体实践进程也是密切相关的。

正是在这个新的历史阶段，一种本来由诗人和艺术家代表的“回归田园”的审美趣味，最终成为当代人普遍的理想追求和生活方式。只有深入研究和把握这个社会条件，才能真正处理好城市和乡村的新型关系。

首先，是城乡关系在城镇化的更高阶段的重构。在城镇化的初级阶段，城乡关系主要表现为“洋”和“土”的激烈矛盾。农村的一切，从生产劳动、价值观念到具体的衣着和生活习惯，都是城市要改造和变革的对象。而希望自身快速现代化的城市，其所做的一切就是拼命割断城市和乡村的全部联系。

这既是城市传统文脉在“大拆大建”中被破坏得最严重的时候，也是文化村镇被“工业化”和“商业化”摧残得最严重的时候。但是问题在于，在远离了乡村以后，城市居民没有实现他们期望的“有价值、有意义”的生活，而是越来越孤独和焦虑。比如 20 世纪初，中国第一批从乡村走出来的“先富人群”，逢年过节最通常的选择是到国外那些最洋气的地方旅游。

但在见过各种市面、开过“洋荤”以后，近年来他们有一个重要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成功者”开始回到他离开的农村过年过节。不仅如此，有些人还在改变投资和创业的方向，同时开始出现逃离“北上广”、选择回去建设家乡的动向。在这一重要变化的背后，就有政策因素。

2018 年 3 月 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广东代表团审议时指出：“城镇化、逆城镇化两个方面都要致力推动。城镇化进程中农村也不能衰落，要相得益彰、相辅相成。”

如果说在过去主要是城镇化，是农村的资源向城市迁移，那么这里提出的逆城镇化，就是城市资源和人口流向农村的新趋势。在乡村振兴、逆城镇化等政策引导下，中国文化村镇也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其次，是城乡文化关系在转换经济发展方式背景下的变化。过去文化村镇的边缘化，主要和其经济地位的急剧下降密切相关。但近年来，在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转换经济发展方式的双重压力下，以往那种“唯 GDP”的发展方式正在被摒弃。

---

同时，在“十三五”时期以来，中国已逐渐摸索出一种新的发展思路和路径，即“文化引领区域和城市高质量发展”，并初步形成了一个新的系统。目前在区域层面上，以“大运河文化带”为例，国家中心城市如北京提出建设全国文化中心；一般城市如景德镇提出建设人文城市。

文化村镇是这个体系中最基础的层级。在这个新的发展系统中，文化和经济、历史和现代的关系，既不是一种对立关系，也不是一种同化关系，而是“引领和被引领”“目标和手段”“内容和形式”“灵魂和躯干”的新型生态关系。

如果说，在“唯 GDP”的时代，文化村镇受到的损害最大，那么也不妨断言，在文化引领经济的时代，文化村镇将是最大的受益者之一。正是在这个背景下，工业化、乡镇企业、商业化、景区化的发展模式的空间将越来越收紧，为文化村镇的文化保护传承、文化资源开发等创造有利条件。

### （三）文化引领文化村镇发展的新观念与继承方式

城镇化和农村发展总体关系的理顺，文化引领经济发展趋势的不断强化，为解决文化村镇的保护和传承提供了总体框架。在这个背景下，提出“文化引领文化村镇发展”的建设思路，对于经济凋敝已久、文化同样衰落的文化村镇，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摆脱小农经济的思维方式，进行文化村镇发展的观念变革。

文化引领文化村镇发展，要求在观念上走出文化历史遗产保护的藩篱，在操作上密切结合新型城镇化、促进城乡融合发展、消费升级、文化和旅游融合发展等政策和战略布局，具体还要遵循以下几个原则：

一是在指导思想上，文化村镇一般和传统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需要将自身的规划建设提升到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重要空间支点和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新期待的战略高度，以保障创造和创新的方向性。

二是从供给侧出发，要密切结合文化村镇的地理、经济、社会、人文等条件，精心研究和制定文化旅游消费产品的生产和流通政策机制，有效引导最独特的文化资源找到最适合自己的空间表达方式，提高供给的质量和效率。

三是从需求侧出发，在内容创意和传播推广上下足功夫，认真研究当代消费者喜闻乐见的内容和形式，并结合文化村镇特有的空间、功能不断创新，努力营造传承特色文化和良风美俗的浓郁社会氛围和长久消费机制。唯如此，文化村镇方能真正融入文化引领经济发展的时代大潮中。

观念的变革必将带来方法的创新。在某种意义上，文化村镇首先要做的是如何重建自身的文化传统。与城市一样，文化村镇目前最突出的问题是“没有特色”和“千镇一面”。

比如许多文化村镇都建设民俗展示馆，以收集和展示农耕时代的生产工具和生活用品，或者挖掘村镇的历史和人物等为主要展示内容，但也都难免于门前冷落的结局。

这种“见物不见人”的粗放型文化规划建设，看不到什么和当代人有关的思想、情感和价值。而要改变这种粗放发展的现状，首先需要确立文化继承的原则，避免腐朽的村镇文化复兴，然后是明确符合文化村镇特殊要求的继承方法。

1957年8月，冯友兰先生在《光明日报》发表《中国哲学遗产底继承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中有些哲学命题，如果做全面了解，应该注意到这些命题底两方面的意义：一是抽象的意义，一是具体的意义。”

其中特别讲到，“在中国哲学史底丰富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讲修养方法与待人处事底方法。这些思想按其具体意义说，

---

都是封建社会底东西，没有什么可继承的。

但按其抽象意义说，大部分还是可以继承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传统村镇文化也适用于“具体继承”与“抽象继承”的规律。总体上看，田园牧歌的时代已经永远过去，即恩格斯所说的：“今天在一方面都已经过时了”。但显而易见的是，那种用传统文化、乡土社会来抵制现代文明的东西，本身就是没落的，甚至是有毒的。

因此也可以确立抽象继承法，把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都普遍使用的村镇文化所积累的经验 and 知识整理出来。如传统农民的勤劳、勇敢、节俭，尊重自然规律，传统节庆活动中包含的人生哲理，如对父母孝，对国家和民族忠诚，以及义利之别等，这些超越了古代一时一地的小农经济思想，可以被称为人类恒久的思想和人生价值，是我们最需要留住的乡愁，也是中国文化村镇建设最重要的精神觉悟。

## 四、中国文化村镇的地方经验和理想目标

### （一）文化村镇的地方经验及主要问题

一般看来，城市化进程必然出现城乡的对立和矛盾。芒福德就认为：“不论在什么地方，城市的兴起似乎都伴随着大力突破乡村的封闭和自给自足”。

但在中国古代的江南则成功实现了城乡的融合和协调发展。李伯重在《江南农业的发展：1620—1850》中指出：“与工业革命以前的欧洲相比，中国生活的物质、社会及心理方面，城乡一体都很明显。

中国城市的一个特征，是包含了农村生活和农业活动；而像商业银行和工业生产这些属于（或集中于）城市的经济活动，很大一部分都分布在城墙以外的城郊区域。

城镇的特征延伸，其影响超出城外，而农村的因素在城市也受到欢迎。所以，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相互开放的，在中国社会的城镇部分和农村部分之间不存在鲜明的界线把二者划分开来，从理论上讲是一个开放的社会。”

在当代也如此，改革开放以来，很多城市的繁荣都是以农村的衰败为代价，导致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城市化后遗症。但苏州是一个例外。一方面，苏州城市建设的成就有目共睹。从城市人口看，苏州改革开放之初只是一个拥有 50 万人口的小城市，今天已成为常住人口超过 1000 万的特大城市。

从城市经济看，苏州以占全国 0.09% 的土地面积和 0.77% 的人口，创造了全国 2.1% 的地区生产总值，是全国工业总产值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大城市。另一方面，苏州农村同样欣欣向荣。

截至 2017 年年底，苏州农村集体总资产高达 1840 亿元，村均年稳定性收入为 815 万元，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达 2.99 万元，城乡居民收入差为 1.958: 1。与大多数城市相比，苏州的城市化是带着农村一起跑的城市化。

但不能忽视的是，当今长三角的文化村镇也依然有很多问题。比如长三角的江南文化名镇与其他地区相比，尽管超越了工业化的陷阱，选择了旅游业作为替代性经济支柱，但也存在文化和旅游不融合、不协调的问题。主要表现在规划建设中所反映出的几个问题：

一是在空间上看，没有认真研究每个小镇的独特自然机理和资源禀赋，“一个模式到处套用”，如某市区内两座江南古镇，相隔不过十几公里，但空间格局和主要建筑形态基本上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

二是在内容上看，缺乏对历史文化精华的基本把握和深入研究，仅靠一些互联网上真假难辨的碎片化知识进行主题规划，是各种概念性规划、策划研究“面目惊人相似”的主要原因。

三是在产业规划上看，不是真想做符合小镇定位的文化产业或文化旅游业，把古建筑、文保单位、文化名人、自然风景名胜等作为商业卖点，希望以此来套取各种政策红利和市场投资，打造新的形象工程，其动机和初心就不纯。

四是一些项目策划和设计过于“罗曼蒂克”，不认真研究或无法把握现阶段人民大众文化旅游的真实需要和实际消费能力，导致了一批新的烂尾楼项目。

五是在政策上“缺少一根最重要的弦”，不能区分中华文化“精华”和“糟粕”，刻意渲染和炒作一些低俗的历史文化资源，已成为下一个治理的主要对象。

这些问题不仅是长三角，也是其他地区普遍存在的，但长三角毕竟走在中国的前列，其中最主要的是在长三角一体化进程中特别提出了“江南文化”。

2017年12月，上海市率先提出“丰富的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是上海的宝贵资源，要用好用足”。2018年4月29日，上海确立了建设红色文化品牌、海派文化品牌、江南文化品牌三大重点任务。

2018年12月，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宣传部门联合发表《江南文化研究无锡共识》指出：“加强江南文化研究，推动江南文化传承创新，是长三角‘三省一市’的共同使命，是推进长三角更高质量一体化发展的内在要求”。上述探索对于重建和修复中国城乡的文化功能，在微空间上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 （二）文化村镇的理想目标

与体量大的城市相比，文化村镇在文化引领上有很多优势，如文化资源特色明显、实施相对灵活等，其在文化引领中起到的先行作用也将有助于理解和解决城市发展中的诸多困惑。因此，一个理想的文化村镇应该具有以下特点。

从理论上讲，在大都市占据主导地位的当今世界，文化村镇与中世纪的城市很接近。芒福德以诗的语言表达过这些理想的城市：“在12世纪时，水车的声音在伦敦绿油油的田野中非常动听。在夜间，四野俱寂，万籁无声，只是偶然有动物的骚动声或城镇上守夜人报时的声。

中世纪的城镇上，人们可以整夜熟睡，丝毫没有人们的喧闹声或机器的噪声。”按照这个理论，理想的城镇的基本特点是既包括城市的繁荣但又不像当今大都市那样喧闹，在像传统乡村一样安静的同时又拥有城市生活的便利和文化。

从历史上讲，中国古代江南的市镇最为接近理想中的文化村镇。江南村镇的基本特点是既有城市的繁荣，又能把这种繁荣保持在一定的范围和程度内；既有自然和乡村的宁静，又有足够丰富的文化艺术生活和不亚于城市的思想和精神；既是一个从自然走向文明中心的起点，也是一个只要人们愿意就可以从城市回去的地方。

其中最重要的是，从文化资源的角度看，江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诗性文化，代表了我国区域文化在审美和艺术上的最高水准，是中国本土最符合马克思“人的全面发展”和“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的思想文化谱系。

从现实来看，理想的文化村镇要能提供有诗意的生活，而不是精神空虚的农业地区，要契合党的十九大报告“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的要求。

---

江南文化村镇是最具有江南文化特色的空间，获得了良好的发展空间和政策支持，可以成为《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继承发展优秀传统文化，共同打造江南文化等区域特色文化品牌”这个历史任务的主要承载者，成为最接近理想中的文化村镇的一个示例。